

# 筭路蓝缕

《辛亥革命史》编著初始手记

章开沅

- 1/13 五卷领导组成立  
号谈叙
- 一 定稿日期：于9月、  
林修等、陈俊清、王  
天黎、葛双臣。  
协助工作：叶祖瑜  
武纪（待定）
- 二 署名问题：由各单位  
负责研究后提出名  
单：① 武汉等号；  
② 长沙等号；③  
代拟等号；  
④ 号加订正号。以上  
份数以拟议后，于9月  
各单位在各自负责  
范围内予以（但不提）  
柳文。
- 三 经费问题：由编委会  
负责借借、集中使用。  
支出原则：① 为书号；  
② 会议开支；  
③ 其他无任指指口号  
印（用于书号）。  
旅费等一般由各单位  
负责。



章开沅

# 筲路蓝缕

《辛亥革命史》编著初始手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筓路蓝缕:《辛亥革命史》编著初始手记/章开沅.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7-216-08899-2

I. 筓… II. 章…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4381号

责任部门:时政经济分社

责任编辑:马 骏

封面设计:汪 汉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王铁兵

---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344千字

版次:2017年3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16-08899-2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22.5

插页:8

印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38.00元

---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1926年7月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荣誉博士，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创办人。

章开沅先生于1951年到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84—1990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3—1990年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培

养和影响了一批活跃于国内外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中青年知名人士。曾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湖北省劳动模范”“荆楚社科名家”等荣誉称号，先后承担“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清史纂修工程（通纪、宗教志）”“东北亚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及中国商会史、近代化道路比较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及中国教会大学史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其辛亥革命史研究和贝德士文献研究，先后有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给予报道和评论，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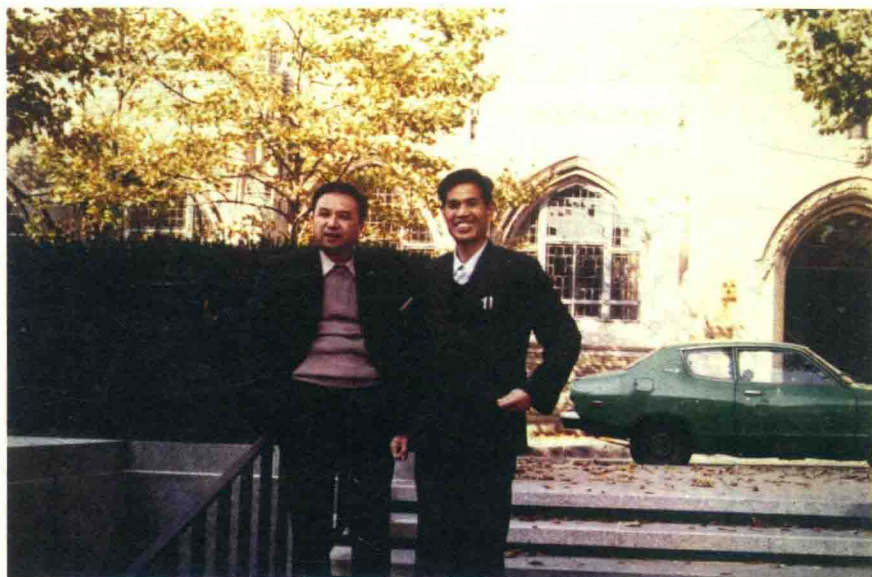
1976年11月24日，长沙会议全体同志瞻仰毛主席革命纪念地清水塘后合影留念



1976年11月编写组长沙会议期间，瞻仰毛主席故居合影。前排右起：林言椒、年轻编辑；后排右起：苑书义、戴逸、章开沅



编写组在贵阳会议后游龙官洞。左起：吴雁南、林增平、章开沅、王天奖、隗瀛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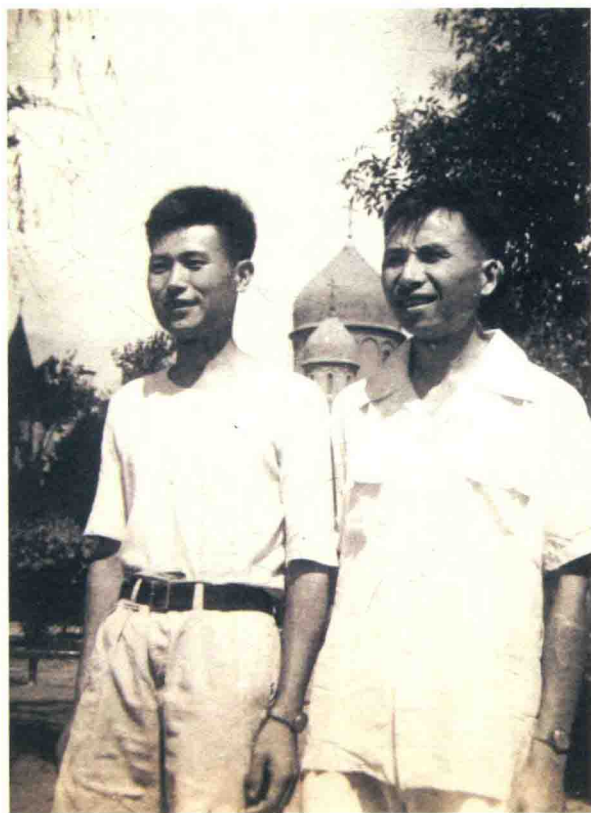


1979年章开沅（左）与武汉大学萧致治教授联袂访美。图为1979年10月在美国纽黑文耶鲁大学讲学后，二人于寓所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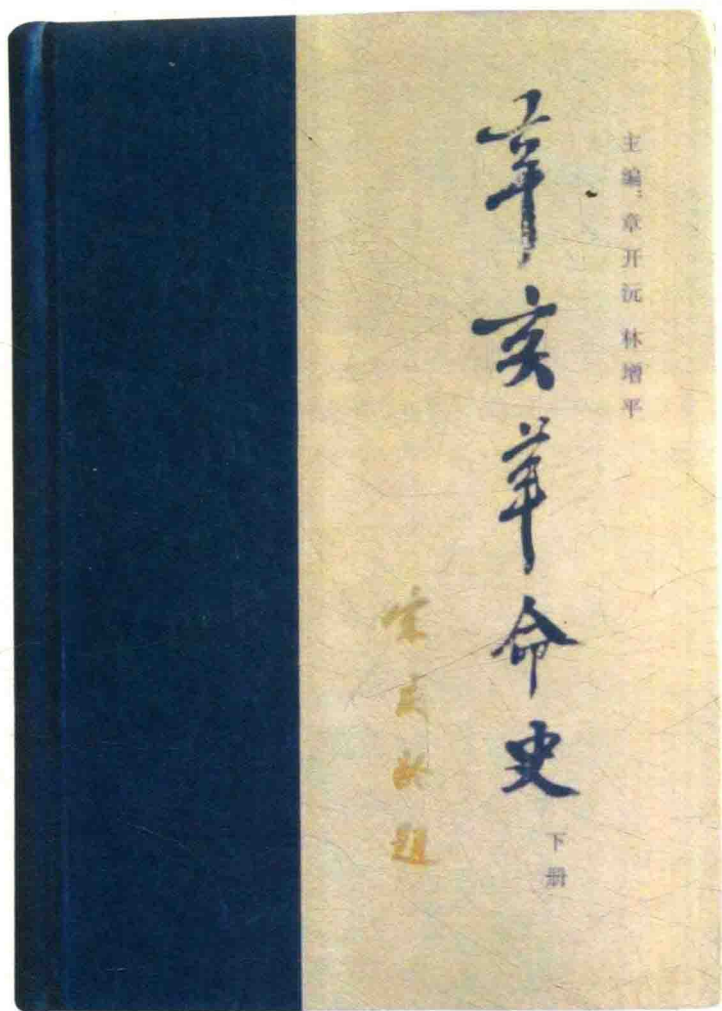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史》编写期间，成立了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图为1980年该会部分理事合影，右起：张磊、章开沅、林增平、刘望龄（秘书长）等



1963—1964年，章开沅被借调到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期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张謇，本书所选《张謇传札记（1）》，即成于此时。图为1963年暑假章开沅（右）与助教刘望龄于北京某公园合影





人民出版社版《辛亥革命史》书影

## 编辑说明

一、本书收录章开沅先生手稿影印版。因笔记行文仓促，字迹较草，为便于读者辨识阅读，同时附上排印版。

二、排印版文字及版面原则上尽量与手稿影印版保持一致，但在编辑整理过程中，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如下处理：

（一）编者解释、说明的文字，用（ ）标注；补充缺字，用〔 〕标注；表明衍字，用〈 〉标注；改正错误或规范用字，用〔 〕标注。以上均用仿宋字体，以与原文相区分。

（二）标点符号，在不改变文意的情况下径改，以尽量规范及保持上下文统一。

（三）序号和数字，在不改变文意的情况下根据上下文径改，以保持局部的体例统一。

（四）繁体字、异体字、旧体字，在不改变文意的情况下径改。

（五）受版面所限，排印版中个别文字未能与当页影印版完全对应，相应移入前后相邻页码中。

（六）《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会议上的发言者，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当时身份。

## 目 录

自 序 / 1

附 言 / 9

《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个人笔记本 / 11

附：张赵密函笺证（节录） / 215

## 自序

我祖籍浙江吴兴，出生地为安徽芜湖，最后却定居于湖北武汉，从1949年7月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六年了。

武汉是辛亥首义之地，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从1954年就决心从事辛亥革命研究，至今也有六十一个年头了。

可能我留给湖北武汉的最好纪念，就是与亡友林增平共同主编的那部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这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通史型辛亥革命学术专著。我从小就敬爱的宋庆龄女士，亲自为此书题写了书名。随后又为武昌首义纪念馆（湖北军政府历史遗址）题写了馆名。这些事都为武汉增添了光彩。

最近几年，为了协助华中师范大学同仁编辑我的文集，可谓竭泽而渔，把积存文稿罗掘一空，连数十年残存的海内外友人来往信札也很少遗漏。正是在翻翻检检的过程中，偶然发现《辛亥革命史》编写组草创期间自己的笔记本（1976年11月至1978年初）。当年编写组情况比较特殊，工作地点又常流转，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记事文献存留。这本残缺不全的私人笔记本，阴差阳错地夹在杂乱的书籍与文稿之中，倒真是难能可贵的原始档案。

大型辛亥革命史专著的编著，最初是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林言椒倡议的。1973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参与《历史研究》复刊工作，正好他也从“五七”干校回到人民出版社恢复工作，由于过去相知甚深，而且这两个单位又有业务联系，所以交往较密。不久，邓小平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重新整顿被“文革”打乱的各项工 作，而且颇见成效，因此引发许多学界友人的殷切期望，并且颇思有所作为。1975年夏，《历史研究》重新收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黎澍恢复主编职务，编辑部随即改组，我乘机离开，坚决回武汉华师工作。临行之际，林言椒向我郑重建议着手编写通史型辛亥革命史专著，我慨然允诺牵



头组织编写组，因为这是1961年武昌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上，吴玉章、范文澜等长者的恳切叮嘱。

我回校工作以后，林言椒又专程来武汉具体磋商，当即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委托，以我的名义邀请林增平共同主编，并邀武汉大学萧致治、四川大学隗瀛涛、贵阳师范学院吴雁南、河南社会科学院王天奖等参加编写组。正当我们紧锣密鼓准备大干快上的时候，国内形势风云突变，邓小平再度下台并成为批判对象。我们编写组的筹备工作只能转入“地下”低调进行。幸好1976年秋天，“四人帮”彻底垮台，“文革”十年动乱终于结束，拨乱反正，百废俱兴，各行各业顿时重新焕发了蓬勃生机。《辛亥革命史》被正式列为人民出版社重点大型项目，而且预定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重要献礼工程。编写组的筹建遂由“地下”转为“地上”，分别获得中共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河南五省省委宣传部及相关院校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同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同行学者也都热心关注，每逢编写组召开重要会议，多有远道专程前来参加并且认真讨论发言者。我保存的这个笔记本，大体上记录了1976年11月至1978年初期间编写组的主要活动、会议发言以及我本人的讲话纪要。

现时的年轻学者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编写一本学术专著，要开那么多会，那么多人参加讨论，还有很多是与历史学毫无关系的“他者”？其实，连我们自己现在也很难想象，当时竟然会花费这么多时间与精力而又如此认真地来经办这些大而无当的编写会议。

必须要回到当时的真实历史情景，才能有所理解。因为十年动乱的消极影响极为深重，“四人帮”虽然垮台，但其流毒并非轻易就能消除，而“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更属根深蒂固。因此，编写组成员不能不认真清理自身的学术思想，通过不断讨论，相互交流，以求摆脱错误成见，寻求新的学术共识。从笔记本上这些发言，可以看出这一学术群体的心路变化历程，原汁原味，生动鲜活，大体上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应该指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学术界的思想仍然是比较混乱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主编，倾听众言，存同求异，寻求若干必需的共识，实在是非常困难，然而这一过程却又无从避免。

会议次数甚多，规模愈来愈大，而会期又愈来愈长。这与当时上

级领导仍然坚持“党委、专家、工农”三结合的群众路线与集体编书有密切关系。

笔记本上有相关记录，1976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党委副书记在长沙会议上向编写组明确宣布：“《辛亥革命史》由第四编辑室海波（副主编）负责。书的特点：①落实毛主席遗志；②得到各省、单位党委领导；③指导思想明确；④贯彻71年出版工作会议纪要；第五条是群众路线（43号文件）。工农兵占领史学领域，五个省、八个单位，是群众路线创作的一个发展。工农兵占领上层领域，为发展工农兵理论队伍服务，在学术专著上作出贡献，也是对‘四人帮’的战斗。”讲话结尾还提出三点要求：“1. 坚决依靠当地党委领导；2. 工农兵是主力军，专业人员向工农兵学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世界观。在观点上有争论，应先百家争鸣，然后再集中。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求大同，存小异。最后不是工农兵说得算，也不是专业人员说了算，而是党的领导说了算。希望写出一本有相当水平的、生动活泼的、对群众有益的好作品。”

我与这位领导素不相识，此次会后也再未见过面，可以说是只有这一面之缘。他的讲话不长，但简明扼要，我是作为顶头上司重要指示认真记录的，全都是原话，未加任何更改。现在看来，基本上还是属于“按既定方针办”的范畴，但我们只能按照他的指示运作。根据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建议，我们选定武昌造船厂作为合作编写单位，并且为该厂参与编写的工人代表做了大量辅导工作。因为这些“工人代表”实际上都是该厂的年轻技术骨干，“文革”期间统统下放到各个车间劳动，所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工人师傅”。他们之中不乏来自清华、哈军工等名校的高材生，写作能力尚称老到，但毕竟与史学相距太远，对辛亥革命更缺少应有的了解，所以必须从基本史实开始补课，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与讨论。但会上一定要有他们发言，写作也要让他们承担若干章节。其实大家内心都知道这必定徒劳少功，但仍然不得不认认真真走过场。其他四省情况亦多类似，不仅“工人师傅”所写书稿最后无从采用，连参与“人海战术”（当时所谓“群众路线”）的许多青年教师的初稿也基本上报废。唯一的例外，是贵州平坝一家飞机工厂的工人代表冯祖贻，他原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何兹全教授的研究生，“文革”期间下放“三线”工厂劳动锻炼，不

过他已转而担任工厂子弟学校的教师。他虽然以古代史见长，但很快就融入近代史研究行列，最终被正式吸收为编写组成员，参与全书的定稿与出版工作。因此，他常说是我们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本笔记所录文字，包括三次会议，即长沙会议、贵阳会议与成都会议。长沙会议之前，应该是在武昌造船厂开过编写组的建立与长沙会议筹备之类的小型会议，可惜未能保存记录，记忆又早已模糊不清。

长沙会议最为隆重，人民出版社党委副书记亲自到会指导，北京、上海、广州也到了许多重要代表人物，如戴逸、黄彦等，并且参与热烈讨论。笔记所录1976年11月12日《揭批“四人帮”在史学领域的罪恶活动》、11月26日《问题讨论介绍》是我两次大会发言的提纲，前者是例行的批判开路，后者则是根据讨论实际状况，集中问题引向深入探讨。此次会议从1976年11月下旬一直开到12月12日，因为小组和大会讨论都非常热烈，有时争辩相持不下，而编写提纲的拟订与各单位分工更是细微复杂，需要在会前会后做许多耐心协调工作。

我们编写组主要骨干回武汉后，12月18日在武昌造船厂开过一次碰头会，决定1977年4月在贵阳再举行一次编写组全体大会，会前应完成各章节初稿的一半以上。然后由我起草《辛亥革命史》长沙会议汇报提纲，包括三个部分：（1）会议情况；（2）收获和问题；（3）下步工作。先后向学院领导与湖北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提纲中还提到“向领导小组汇报、请示工作”，显然是编写组的“上级”，但究竟由哪些人组成，我已经毫无印象。我只记得省委宣传部曾派一个年轻干部张俊经常来编写组联络，做些上传下达的工作。

1977年4月14日，贵阳会议开幕，照例又是“大批判开路”，笔记本上《批判会发言》是我会前草草写成的提纲。贵阳师范学院的孟书记与贵州红湖机械厂的田处长在开幕式上讲话，可见贵州省委对会议的重视，但这两位官员究竟讲些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印象。倒是此前曾拜会贵州省委宣传部长，此人是个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前曾任贵州地下省委书记，其言谈倒极风趣。一见面他就说：“我们贵州名声不好。”我们问何以见得，他一本正经地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成语：一个是‘黔驴技穷’，一个是‘夜郎自大’，既已‘技穷’，还要‘自大’。”大家都笑成一团，顿时亲如知交，但以后似乎也没有听说他在仕途上有多大进展。不过他说的倒是老实话，贵州确实是

穷，贵阳师院作为东道主连几间像样的卧室都找不出来，所以只能把我们安置在市劳改局接待前来探视犯人的家属宿舍里，其简陋与肮脏可想而知。一日三餐倒是经商业局批准，弄到一点“特供”，无非是增加若干粮油定量与少许冰冻带鱼而已，但在师院已属难得“牙祭”，前来陪我们进餐的“相关人员”几乎与外地代表人数相近。

但那些年月，编写组成员全心全意从事撰述，对这些生活细节反而毫不介意，甚至还有点自得其乐。由于已经有三个月的撰写经历，大家业已先后进入角色，所以讨论比长沙会议更加具有实质性内容，主要业务骨干与责任编辑的作用日益彰显。但由于要互相交换阅读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会期仍然较长，从4月14日到4月25日整整有12天。最后由林言椒从出版角度，对体例、结构和文字内容提出统一要求。并且确定5月底由林增平、隗瀛涛、章开沅各写一节作为样稿，并对其他承担单位分别提出交稿期限，以便打印提交10月下旬成都会议阅读讨论。

笔记本上没有分头撰稿状况的记述，只有1977年10月29日我在《辛亥革命史》成都会议的预备会上所提建议要点，可以看出两位主编对全局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全书框架、结构、体例乃至文字表述等总体思路的逐渐清晰成形。提要的末尾还有预定会议日程：

- |              |                  |
|--------------|------------------|
| 10月26日       | 开幕式，传达文件，批“四人帮”。 |
| 10月27日       | 到大邑。             |
| 10月28日至11月5日 | 看稿。              |
| 11月6日        | 都江堰。             |
| 11月7日至19日    | 分篇初议。            |
| 11月13日       | 市内参观。            |
| 11月20日       | 新都参观（金堂彭家珍碑）。    |
| 11月21日至25日   | 讨论。              |
| 11月26日       | 闭幕。              |

日程之后，有小诗一首：“峨眉雄奇岷江清，蓉城秋色满眼新（巴山蜀水万象新）。各路健儿重聚首，攻书愿学李时珍。”这是我书赠编写组全体成员的，到成都后正好集体看过传记片《李时珍》，遂引以为撰述范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成都的市容与饮食供应都远远胜于武汉，堪称真正的宜居城市。



东道主四川大学可能经费较为宽裕，把编写组外地人员全部安排在省府第二招待所接待重要客人的东二楼，清静安逸，与贵阳劳改局招待所形成鲜明对照，大有苦尽甘来之感，所以工作劲头益增。成都会议“务虚”的意味日益淡薄，由于完稿期限日益迫近，所以着眼于具体撰写的“务实”乃成大家更为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变化，在笔记本上都有详尽记录，集中体现于会后我起草的《成都会议汇报提纲》。由于此前大家的共同努力，尽管走了不少弯路，浪费许多时间精力，但总算写成了百分之九十的章节初稿，总共约80万字。其中有四章（约占四分之一）史论结合较好，且有一定新的见解；有二分之一可为修改提供基础。经过认真阅读与深入探讨，大体上厘清了修改的重点乃至形成具体设想。所以这一年多时间并非虚度，我们决定春节以前把缺稿全部补齐，把初稿自己修改一遍。1978年2月至4月由林增平、隗瀛涛先行分编统稿，6月以后再抽调精干力量集中到北京修改定稿。

可以看出，成都会议是编写工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大兵团作战与频繁流转开大会至此基本结束，北京集中少数人潜心修订全书遂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成都会后，心中有数，方向已明，心情特别舒畅。乘江峡轮顺流东下，凌晨广播通知即将过三峡，我习惯早起，立即奔赴船头扶栏眺望，两岸景色如画，船过夔门时江面突然变宽，天空顿时扩大，思潮汹涌，又得一诗《过三峡》：“瞿塘映明月，神女绕白云。红日出江峡，群峰染朱痕。苍鹰振翮飞，鱼鸥逐舟行。羊憩悬崖上，丹桔满绿林。大治蜀行易，欢悦东归情。国强山河壮，前景更光明。”虽然还够不上壮志凌云，却已是豪情如火，仿佛又一次奔上战斗征途。

1978年6月，编写组主要成员集中到北京师范大学统编定稿，这才真正进入学术编纂的阶段，有些部分当然是借重各个成员已有的研究成果，但不少章节是推倒重来，认真核对原始文本乃至大量档案文献，同时我又向北京图书馆与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借阅许多海外辛亥革命研究新出专著，对许多章节进行必要补充或修正。1978年12月18日到20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我们于是又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经由编写组委托，我根据既往长沙、贵阳、成都三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结合北京定稿期间新的认识，在华师学报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大体上可以看作全书定稿阶段的